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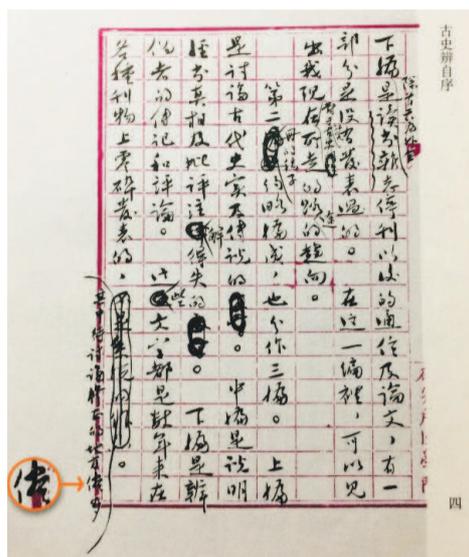
# 关于顾颉刚著述的文献学札记(四则)

季琳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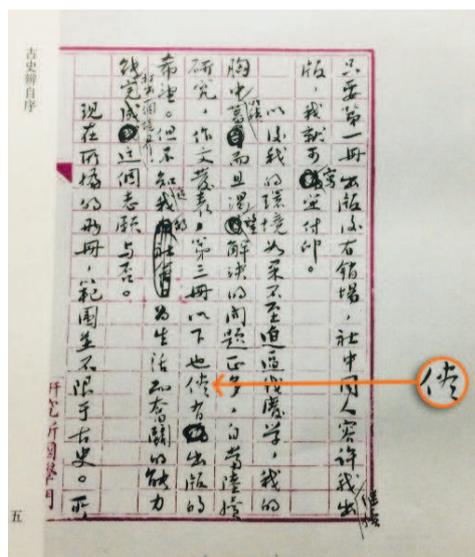
顾颉刚的学术底色,其实是古典式(尤其宋代至清代)古典学研究的“集大成者”及其现代转化者。这是在“出土文献与古典学重建”的新时代背景下,需要后学们悉心领会的一份瑾瑜一般的巨大遗产。

以学术为使命的学者,读万卷书,行万里路,融会贯通,增广见闻,为把自己活成一部“活的书”而时刻准备。为学之道,是将长时期修养积累的成果构成一个封闭体系为好?还是将自己作为某种媒介,让汇聚其间的问题经过思维辩证之后后发出他人更多的探索为好?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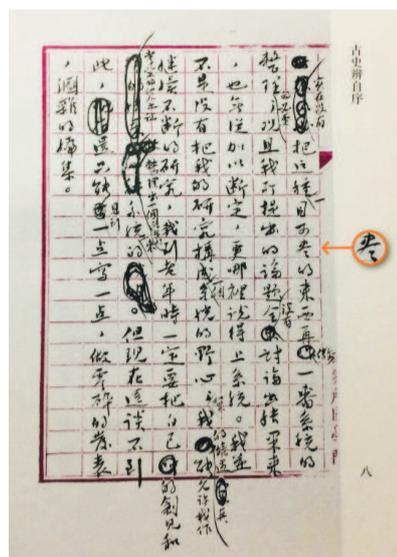
笔者无学,现把关于顾颉刚著述的文献学方面的几个“得其间”的零星观察作一呈现,一方面是公布闻见,一方面也是提出问题,希望海内读者共赏之后能够有以教我。



(图1)“很多”的“很”字在手稿中写作“儘”字。



(图2)此页上的“儘”字,在排印文字里就作“儘”。



(图3)“儘”字右边的“盡”形,在此页可以找到一个参照物。

《古史辨》第一册自序有一段话:

第二册的稿子约略辑成,也分作三编。……这些文字都是数年来在各种刊物上零碎发表的,其中待讨论修正的地方很多。(第2页)

查2006年中华书局影印的《古史辨自序》手稿,发现引文中“很多”的“很”字,在手稿中写作“儘”字(图1)。

这个“儘”字,在手稿下一页也可就近找到一例(图2)。这一处“儘”字,在排印文字里就作“儘”。其实只要看到影印手稿第4页“儘”字左边十分清楚的单人旁,就可以知道并不是“很”字。至于该字右边的“盡”形,在手稿第8页也可找到一个参照物(图3)。

到此为止,我们可以得出结论:手稿上写的是“儘”字,

排印文字中的“很”是一错字,大概由于“儘”字书写在红色边线上、写得较小、右旁“盡”的行草体易与“艮”形相混而造成。后世所有的《古史辨自序》版本,都作“很”。然而,“儘多”与“很多”在语意上几乎无所差别(关于“儘”的大量语例,可参《汉语大词典》第1卷第1719—1720页)。所以这个排印的错字,词不害意,顾氏校对时应该不会措意,甚至根本没有发现。

不过,在手稿本与排印文字之间,也有一些文字变化可以确定是顾颉刚有意识修改的结果。例如《自序》谈到1923年发表《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》之后的学术进展,提及在笔记中围绕着若干题目搜集材料,

其中一个题目是:

春秋战国时的书籍(著作、典藏、传布、格式等)。(第59页)

而在影印手稿的第218页,并没有括号内的“著作、典藏、传布、格式”等文字,这样的内容,一定是顾颉刚本人加上去的。添加的时机是交付手稿之后,顾氏拿到排样稿之际又做了一番修改。

以上是在字句层面,举了两个《自序》文字前后变化的例子。笔者还想以一张纸面为单位,立体地透视一下这张纸面上的墨迹:哪部分是先写上去的,哪部分是后写上去的。今以影印本第571页也即《自序》最后一页为例(图4)。

在这一纸面上分析出时间

层次的关键线索,乃是落款的书写位置必定要与最后一段正文隔开几行。因此,这一面于4月16日最初写完的样子,应当如(图5)所示(我们这里先采取“抓大放小”的办法,右侧阴影部分的文字暂不考虑在内)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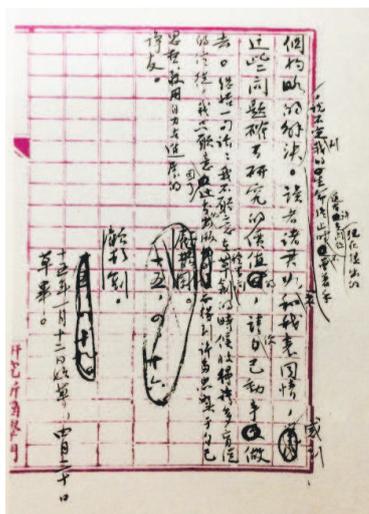
在(图5)的基础上,顾氏进行了第一轮修改,结果如(图6)所示。

两个红框里面的文字增删,是同一轮改动的结果:既然在原先的最后一句话后面又添写一段话,那么原先落款的位置必定要移左,于是把原有落款划去,新的落款日期是4月19日。这两处红框的一增一删,可以作为特定一轮修改流程的标准,用来归类其他文字。此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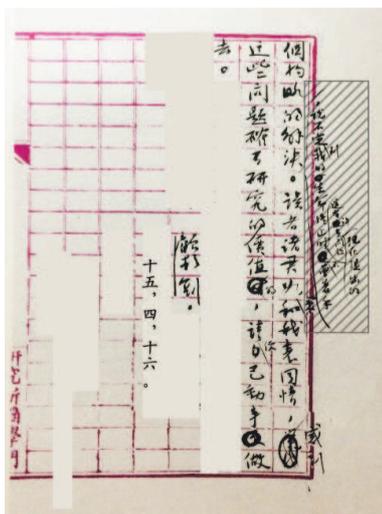
顾氏再进行一轮修改,把落款改为4月20日,也是“草毕”的日子(图7)。

同样,紫色方框虽然只在这一页上,但也可以涵括其他页面上的许多修改文字,将其归为同一个时间层次。以上只是单纯根据落款位置与正文末行之间的距离这一惯例,将此一纸平面立体地分为三层。而一旦我们探寻《顾颉刚日记》关于写作《古史辨自序》过程的记述,还会发现特殊的标志。4月10日,记载“草自序三千余言(初稿毕)”。在此后的阶段,4月12到15日都有“改”或“修改”自序的记载。4月16日的用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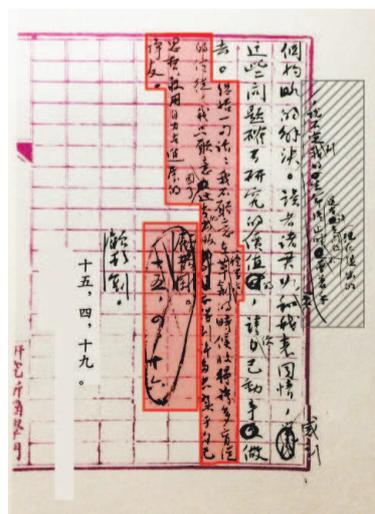
(下转13版) ➔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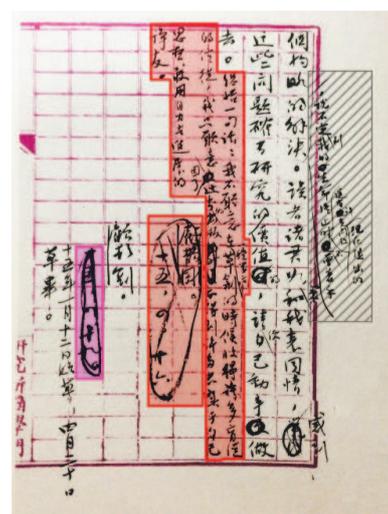
(图4)影印本第571页,即《自序》最后一页。



(图5)应是(图4)于4月16日最初写完的样子。



(图6)是在(图5)的基础上进行的第一轮修改。



(图7)再进行一轮修改,把落款改为4月20日,也是“草毕”的日子。